

塞北文苑萍踪

章叶頻



塞北文苑萍踪

章 叶 频

(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和浩特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 呼和浩特

前 言

这是作者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到一九八三年，在治病、疗养的过程中，当病情好转，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下，陆续写的十几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既不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南征北战的伟大历史画卷，也不是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的自传。它仅仅是在旧中国三十年代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生活于文化落后偏僻闭塞的塞外，在祖国灾难深重，人民遭受熬煎，个人处于苦闷、彷徨、迷惘中，探索人生的要义，追求革命理想的一些经历。在那黑暗的年代，作者曾以极其旺盛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能够找到的各种流派的文艺作品，中外伟大人物的传记，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进步刊物中，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目的，明确了奋斗的方向，憧憬着一个朦朦胧胧的革命理想。于是摸索着前进，热情地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地下外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逐步接近革命，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投入党的怀抱。

这几篇回忆录，是按照当时生活实践经历的顺序写的，原来就都各自独立成篇，为了交待清楚，难免有重复的地方，这次整理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删减。

这些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个人经历的踪迹，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省文艺界的一些端倪，对了解三十年代绥远进步文艺运动发展的脉络和绥远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这或许对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省的文艺运动的同志们，有所帮助吧！

章叶频

一九八五年六月卅日

目 录

我的大学·····	(1)
塞北文苑萍踪·····	(7)
三十年代绥远的新诗歌运动·····	(28)
一、塞原社和新诗歌运动·····	(28)
二、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中一场反形式主义的 争论·····	(36)
三、诗歌与新文字·····	(44)
绥东抗战时期的绥远文艺界·····	(52)
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0)
思念	
——记绥东抗战时期外地来绥的两个年轻人·····	(79)
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	(90)
三十年代绥远文艺界鸟瞰·····	(116)
抗战初期的绥远抗日救亡运动·····	(139)
一、芦沟桥事变到归绥沦陷·····	(139)
二、后套工作片断·····	(158)
三、投入党的怀抱·····	(182)
延安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	(209)
从延安到晋察冀·····	(221)
在晋察冀群众中播下艺术的种子	
——记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期乡艺训练班·····	(236)
回到绥远·····	(253)

我的大学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我是从爱好文艺而接近革命，走向革命的。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满脑子英雄侠义的故事，幼小的心灵就有一种纯朴的正义感，想在社会上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扶危济困。考入中学后，又开始接触了新文艺，看得既多、又乱，几乎阅遍了我所能借到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书籍。我尤其酷爱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创造季刊、周刊、月报，能买到就买了看，买不到就借着看。当时，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李初黎、郑伯奇、冯乃超、穆木天的文章和诗，以及蒋光慈、钱杏邨、沈端先的小说、诗文和翻译的小说，都是我爱读的作品。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也读过了，但是理解不深。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弃医学文的叙述，却对我影响最大。一九〇六年鲁迅看过一部电影，日本军队抓住一个中国人正要枪毙，旁边却围着一大群体魄健全的中国人在看，而看电影的日本学生竟高呼“万岁”，对于这种赤裸裸宣扬帝国主义的电影，鲁迅看后十分气愤，同时也悲愤地感到电影上那群中国人，是在“赏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盛举”，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而认为要改造社会，拯救中国，学医并非一件紧要的事；“第一要紧是改变国民的精神，启发群众的觉悟，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决计要学文艺了。鲁迅弃医学文的动机和决心，更加鼓舞了我爱好文艺的志趣。此后也经常练习写一些短文，在校刊《丰州》和绥远

日报副刊上发表。1932年，即我在中山学院临毕业的那一年，还和同学白维新在绥远日报上办了一个副刊《星原》，又学着写些短文和诗。这样，我和白就认识了绥远日报副刊编辑许的洁。我们经常到报馆看他，他给我们讲他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们修改文章。“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不战而失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悲愤至极，我满眼含泪地写了篇“溪畔哀歌”的诗文，抒发自己对祖国山河破碎的忧心，大声疾呼“振兴精神，挽救民族的危机”，以红叶的笔名发表在《星原》第十四期上。许的洁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后，他悲痛欲绝，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登台讲话，并用刀割破手指，写下了“誓死抗日，收复失地”几个血字。后来他辞职赴东北参加义勇军，许的洁对我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课余读了不少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有些至今印象还很深。如华汗（阳翰笙）的《女囚》，男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在统治阶级的法庭上，遭受敌人严刑拷打，仍无比坚定地说：“信仰就是我的生命！”最后为他的信仰壮烈牺牲。这本小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便把这句话和其他喜爱的文句抄录下来贴在床头作为座右铭。

一九三四年冬，我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弟弟和我，家庭生活的担子便压在了我的肩上。母亲托父亲的朋友，为我在绥远民众图书馆谋得一个事务员的职业。这个职业虽然薪金不多，却给了我一个读书学习的大好机会。我贪婪地抓紧读书，除文艺书籍外，还读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和一些进步刊物，如《读书生活》、《现世界》、《自修大学》、《妇女生活》、《大众生活》、《新生》等。艾思奇同志写的有名的《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从《读书生活》上一期一期地读完，以后又买了单行本反复阅读的。这本书，对我的教育很大，开始懂得了如何生活和生活也可以改变的道理，提高了自己对人生的积极看法和态度，帮助自己接近了唯物论和逐渐树立了现实主义的人生观。

高沐鸿同志（解放初期曾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现任山西

省政协副主席)曾任过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可能因为他的缘故,藏书室虽然仅仅一间房子、七八个书架,却有很多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新兴文学的书籍,甚至《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资本论》、《经济学大纲》、《新教育大纲》(克鲁普斯卡娅著)、《唯物论辩证法教程》、《辩证唯物论入门》,这些书都有,我安慰自己,这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是“我的大学”。我从大量阅读这些书刊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这个时期我还读了许多革命家的传记和革命史。如《列宁与甘地》、《革命文豪高尔基》、《伟大人物的少年时代》、《列宁回忆录》、《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即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柏克曼的《狱中记》、《克鲁泡特金自传》、《俄国革命史》、《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法国大革命史》、《世界史纲》等。还有许多的苏联文艺论著和小说,如《新兴文艺论》、《伟大的十年间文学》、《铁流》、《赤恋》、《毁灭》、《士敏土》、《被开垦的处女地》、《十月》、《一周间》等和日本本间久雄著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小林多喜二的《蟹公船》等几十部世界名著,对自己影响很大。鼓舞最大、感人最深的是李芾甘(即巴金)的《俄罗斯十女侠》。这是一本描述俄国革命运动中十个女革命家的故事,记得其中有苏菲亚·亚罗伯斯卡娅、薇娜·菲格念尔、沙苏丽奇等,有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现在看来有些是民粹派或无政府主义者。当我看到那些女革命家为了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脱离家庭,深入农村,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忍受统治者的各种残酷迫害和侮辱而视死如归,始终信心百倍,坚持不懈地奋斗。她们那种英勇的忘我牺牲精神,感动得自己每读一遍都要淌泪。尤其想到:生活在东北已经沦亡,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中国男儿,如不惕励奋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改造这不合理的社会而努力,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国,也愧对于那些俄国革命的女英雄。

尽管这个图书馆有这么多好书,可是在当时文化落后的绥

远，人们还不懂得很好利用它，到这个图书馆借书看的人很少，只是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除了附近旅社住的几个外乡客人，为了消磨旅途寂寞的时光，借两本小说看看外，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借书。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日报》副刊上，鼓励青年们到图书馆看书。一篇是《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举出，凡是到过北平图书馆的人，都会看到每天那儿云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年轻的小伙子，有年老的学者、教授，还有以卖文为生的作家和买不起参考书的贫苦学生……总之，尽是一些求知欲旺盛的人们，他们为了充实自己或者为了钻研某个问题，终日埋头在书堆中，把图书馆看成知识的宝库，书籍是他们最亲密的友人，好学的习惯和探索真理的愿望，使他们在典籍中找到了乐趣，甚至有人说：“如果有饭吃，环境许可的话，就是在这儿呆一辈子也愿意。”可是在绥远却大大不同了，归绥虽然也有两三个图书馆，但是每天去看书的却寥若晨星，据一位在绥远较大的图书馆作事的朋友说：他们每月统计，借书的也不过百十人次，平均每天才三人次多，这与北平图书馆读者拥挤的情况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当然有些劳动人民，为了生计，整天奔波，哪有功夫到图书馆看书；但是一般青年却也糊里糊涂混日子，真是可惜！那些既有固定职业，又有靠山，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们，有时间宁可打几圈麻将，也懒得看书，而有些所谓上层人物，每天则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报纸也不翻，还看什么书。甚至有一位爱写些文章的朋友，也没有养成经常看书的习惯。苏联文学顾问会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信中说：“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助手和导师。”其实不只青年作家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就是一般青年也应该和书籍接近，养成读书的习惯，从中寻找走向幸福生活的人生大道。如最近读书生活社出版的几种书籍，便都是我们应该仔细读读的。在这整个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个人生活时时都处在不安定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如何来应付这个非常时期的环境，如何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都需要得到一些正确的指

导，而这些书籍便是用通俗的文字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种种事物，正确地指导我们，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结尾写道：“养成读书的习惯吧！如果稍微有所选择的话，‘开卷有益’这句口头禅是含有一定道理的。”第二篇文章是《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介绍一个图书馆》，着重谈读书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的重要，引用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信中的话：“一个初学写作者，能每日留心阅读，以加深他的教养，扩大他的眼见，充实生活经验，增广语汇等等。”又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爱读书的，如高尔基、巴比塞等，也都把读书当作一种嗜好！”这就是说一个初学写作者如果不养成一个爱读书的好习惯，不从过去及现在的那些伟大作品里吸取营养，学习写作技巧，研究作品的成败，想成为一个好的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养成读书习惯对一个作家是如何重要，一个青年作家应该和图书馆发生密切的关系。接着，我介绍了我工作的绥远民众图书馆，把它收藏着世界文学中许多伟大作家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加以推荐，并指出这个图书馆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好书和进步刊物，希望青年作家和要求进步的青年，都和这个图书馆发生密切的关系，来这里挖掘我们智慧的宝藏。

因为工作不忙，我每天除了把阅览室的旧报纸换上新报纸，或者为来借书的读者取书外（本来这是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可是这位拿薪不干事的管理员是根本不上班的），就是读书了。这个藏着许多革命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小小图书馆，真正成了“我的大学”，它大大加强了我本来很浅薄的文学基础和修养，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决心坚强地生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些有益的事情，献身于自己当时思想上的一种朦胧的革命理想。于是我用自己年轻人的满腔热血，以叶频、红叶、伊宁、叶君萍、晓风、格尔、姜一萍、姜平、林菱、卓英、薇妮、音石、音式、托流、浪涛、敬英、阿玉、也平、君频、绚绮等笔名，几年来，写了大量诗文，并且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年轻朋友办刊物、编诗刊、组织读

书会、成立剧社、演出话剧，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发起组织抗日救亡的文艺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救亡工作。我感谢“我的大学”，从她那里出来，我勇敢地进入现实生活中更高更大的学府——光明和黑暗激烈斗争的人间世界。

塞北文苑萍踪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我从北平回到了绥远。那时，正是归绥党的组织被破坏，苏谦益、杨茂盛（杨叶澎）、韩尚宽（韩燕如）等同志被捕后一年左右。

回来之前，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升学，我便集中精力在北平学习日文。因为日文较容易学，我爱好文艺，想掌握日文后能多读点世界名著。另外，有人把我介绍给杨梅竹斜街三十一号世界语书店的主人，一位热情的世界语学者张佩苍先生，他愿意教我世界语，还说：“世界语是团结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的良好工具”，“学好世界语可以在整个地球上任何地方找到通讯对象”。于是我上午学日文，下午学世界语。经过半年多的勤奋学习，这两种文字，我基本上都能翻字典看些浅显的书报了。本来还打算再继续学习两个月，巩固巩固，以便回来后能够自学看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因用功过度，头痛病又犯了，加上经济拮据，吃饭都成问题。而两个月前我给在绥远新闻界工作的同学袁尘影寄回二十几首诗，托他转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希望发表后能得到一些稿费维持生活，继续学习。可是，除了尘影收到我的诗后，给我写过一封信外，诗歌的出路却杳无音讯。于是，我便把刚到北平时买的书桌、凳子等变卖了，还凑不够路费，又借了点钱，才回到了绥远。

回来后，尘影告诉我，我寄给他的那一束诗，已经在杨令德先生编的副刊《十字街头》上陆续发表了，还给我八元稿费。手拿着稿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果回绥前，我能得到这些稿费，也许还可以在北平继续学习两个月，把日文和世界语巩

固巩固呢。

袁尘影是我在中山学院读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他从小受到他舅父杨令德先生的教导鼓励和文学熏陶，在校时，就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有“小文豪”之称。尘影人很聪明，喜爱文艺，读的书很多，特别喜欢读巴金的作品。我最初读巴金的《灭亡》、《家》、《海底梦》，就是从 he 那里借到的。我们几乎把巴金的著作都读过了，很受巴金作品中一些人物的革命激情所感染。记得我们最初从《文学季刊》上读巴金署名欧阳镜蓉的“龙眼花开的时候”这篇小说时，书中有一个革命的名词“轮值”，就是说：当一个革命者为革命刺杀一个反动统治者，或者为了完成某一项革命行动，而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时，就是他“轮值”的时候。我和尘影、李月轩（即李柯、女、党员；任白戈同志的爱人）、周瑞波（李柯的女友，是南开大学进步的学生，因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为了免遭逮捕，来绥远躲避，后到日本留学）一起谈到这个作品时，还很激动地说：“什么时候该是我们‘轮值’的时候呢？”当李柯、瑞波离校后，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龙眼花开的时候”，其中回顾我们当时读这篇小说的情景时说：“……我们以怎样一颗赤热的年轻人的心，读一篇描写未来我们年轻人自己建造一个新世界，其间的斗争生活的故事，我们觉得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未来的写照，我们总有一天会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献给我们的时代。……”当时大家都朦胧地有一种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决心。但是，对巴金作品中那些人物，以暗杀一个反动统治者而又不能动摇其统治，却牺牲了自己的作法也不以为然。

袁尘影当时是《绥远日报》、《绥远新闻社》的记者，并且帮助他舅父杨令德先生编绥远《社会日报》的副刊。我回到家里，既是失学，也是失业，有的仅是时间，于是，我就经常和袁尘影在一起。白天我俩常跑书店，或一同到新城中山学院找英文教师、诗人李穆女；晚上到《绥远新闻社》。新闻社是一个发本

市消息的通讯社，每天出两三张蜡纸的油印新闻稿，供各报采用。编辑部和《社会日报》编辑部在一起，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编辑部只有一间房子，一个长条办公桌，可对坐五六个人。隔壁是个两间大的客厅，放着一台收音机，供《社会日报》收记录新闻用。紧东边是一间客房，有土炕，可以住人。范长江、孟秋江、潘纪文同志等在一九三七年都在这里住过。新闻社订有很多报纸，有上海的《大公报》、天津《庸报》、《益世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全国的一些有名的报纸。晚上，尘影写新闻稿，我就看报纸。这样过了不多久，我就和绥远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老前辈——《社会日报》和新闻社的总编辑杨令德先生以及新闻社的其他同人逐渐熟识了。

除了和尘影一起活动外，这个时期我每天早晨和上午仍然坚持学习日文和世界语，有时也看些文艺书籍，写写诗，偶尔还写一些读后感之类的书报评介。记得我当时反复读过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的《深渊下的人们》，这是一部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书，作者为写此书，冒着生命的危险，亲自深入到一般人认为非常可怕的伦敦东市梢，和那里的贫苦人民生活在一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一切，也曾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晚上同宿在公园的椅子上，半夜又被警察赶走。……读后，我颇受感动，认识到世界上到处都是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多么不合理啊！我激动的心，促使我写了一篇读后感的文章，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当时，我深有所感地想着，如果我们有一个团体，有一个阵地，能经常不断地用诗文为人民说话，那该多好啊！

那时，东北三省已沦亡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国家民族正值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时绥远地区危机四伏，政治和文化处于令人窒息的沉闷之中，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谁甘心生活在那黑暗阴郁的日子里。我和佩堂（武达平）、袁尘影、李穆女既是至交好友，又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我们经

常在一起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甘心沉默落后的心情，我们便从左翼文艺作品和进步报刊寻找慰藉，一起探索人生的道路。在党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我们将满腔的愤懑燃烧起来，化作熊熊热情，投身于进步的文化工作中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和尘影、佩莹（他也是我的同学，和尘影同班，也喜爱文艺，经常在报上发表诗文，他在一九三三年就参加了党，同年在绥远中山学院读书时，因中共归绥县委被破坏，苏谦益同志等被捕，他闻讯和反帝大同盟盟员任双弼同志一起到乡下躲避了一个时期，后又偷偷返校学习。这时他们虽然失掉党和同盟的组织关系，但仍然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文艺团体，出刊物写文章，传播进步思想。）一起到中山学院李穆女那里。看到桌上一叠稿纸，还有写好的两三首诗。大家一面传看，一面谈起绥远的文艺界，一致认为最近绥远文艺界太沉闷了，我们应该使它活跃起来，于是又谈到办刊物的事。原来尘影、佩莹和任双弼曾借《社会日报》副刊，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创刊《塞原》文艺旬刊一种，次年五月十四日出了第十六期后，已有三四个月未出了。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振作精神，负起开拓这块荒芜的文艺园地的责任，便决定重新组织“塞原社”。

关于塞原社和《塞原》

塞原社以我们四人为主，准备逐渐扩大发展些社员，吸收更多的人写稿，并商量另借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的版面，恢复《塞原》文艺旬刊。借《十字街头》园地的事，由尘影和他舅父杨令德先生交涉。很快交涉成功了。于是，大家积极写稿，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在《民国日报》四版上复刊，算是第十七期。我们四人还摄影留念。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时，我回到故乡，在中共归绥市委工作。那时，我母亲还健在，在她老人家保存的一些

像片中找到了这张照片，上面还有我当年写的“塞原社同人合影，一九三四年九月摄”等字样。可惜，这张照片，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

《塞原》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前后四年共出过近五十期，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论文、书报评介、翻译等。尘影是塞原社的主将，长于写散文，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百灵庙行”、“塞外杂写”等几组散文和书评，发表在《塞原》和《申报》的《自由谈》、《申报月刊》上。《塞原》的主要撰稿人除尘影、穆女、佩莹和我外，还有芙茵（即袁烙，现西安晚报负责人）、葛垒、北虹（刘映元）、李曼霖、魏列等，《大公报》名记者徐盈也给《塞原》写过稿。最初，我们把稿件集中后，由尘影送往报馆。一九三四年冬，穆女离绥后，佩莹住在车站，相隔较远，到旧城不方便，就由尘影和我发稿。在尘影外出采访，特别是东渡日本学习后，编辑的责任就全压在我肩上了。也正因为塞原社同人东走西散，稿件不易凑齐，从一九三六年后半年起《塞原》就不能按期出版，往往延期成为不定期刊了。当杨令德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因为在《边防文垒》发表美国记者斯诺的《与毛泽东会谈记》，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电追查责任，而被撤职后，塞原社同人写的文章和出刊的《塞原》、《塞北诗草》，就都不能在《西北日报》发表和出刊了。

这里，我还应该谈谈穆女，他原名李伟昌，是广西人，叔父是华侨。还是在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时，他就翻译过一本《抒情诗》，以穆女的笔名在北平出版。一九三二年下学期他到中山学院任英语教师，便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和诗，颇有学问和才气。他的诗受西洋诗的影响很深，常写十四行诗，讲究音节、节奏、韵脚和形式的整齐。有一次，我和尘影、佩莹去看他，李柯、瑞波也去了。他从饭馆要了几个菜招待我们。饭前，他拿出他发表过的几首诗让我看，问我喜欢哪一首，我看后说我

喜欢题名“祷告”的一首十四行诗，他说 他也喜欢这一首，原诗是：

没有一颗辛酸的眼泪，不是从
我的刺伤了的心头上喷涌；
没有一缕凄痛的咽声，不是在
我的哭哑了的喉咙上进来。
假如有一天，流尽了我的眼泪，
假如有一天，动不了我的喉颚，
那我漫天的幽恨，将永远，
会在我的肚子里打闷转，
也将没有一个人，可怜
我这个孤零人，有恨不能言。

上帝啊！我是十分地诚度，
对你诉说我所希望的心愿：
“我宁愿爱我的人一箭过来把心口射穿，
我不愿这样永在涕泣和幽怨里打闷转。”

在这之前，我们几个人写的诗都很注重形式，有些就是豆腐块式的。在一九三四年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种诗风。

后来穆女还以这首诗为主题写了篇散文，文章开始就是这首诗，他通过到教堂做礼拜发泄对社会的愤懑和不平。叙述他从故都来到这荒凉的塞外，原想多体验些现实生活，结果，刚来就遭到一些卑劣、嫉妒和恶毒的眼光，于是他借牧师的一句话：“我们人类的罪恶，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他把自己的意志当做神，当做上帝。“谢谢上帝，我的意志，把我从历代祖先遗传下来的那些卑劣的观念形态中，拯救出来并帮助我去克服那些残毒的魔鬼。”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战胜那些魔鬼。一九

三四年下学期，他在中山学院的课程还没有教完，就被迫匆匆地提前离开绥远回到北平，后来又到了浙江。刚去，还和我们通讯联系，寄些诗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就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穆女和尘影离开绥远后，塞原社主要成员只剩下佩莹和我了。

为了开展新诗歌运动，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塞原社曾组织了一个诗歌研究会，并出版《塞北诗草》，由我主编（详见另文介绍）。

塞原社编辑出版的《塞原》文艺旬刊是当时绥远文坛历史最长的一个纯文艺刊物，也是当时绥远文艺刊物中质量比较高的刊物之一，在荒芜的绥远文苑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曾发表过刘浪萍的一篇文章“杂谈绥远文艺界”，认为在当时沉闷的绥远文艺界“值得叙述和推荐的要算这一年来崭露头角，异军突起的塞原社所出的文艺旬刊《塞原》了。从天津《庸报》的《另外一页》看到一篇很长的关于由该社发起举行的文艺茶话会素描，也可看到该社的努力以及生气活跃的气象了。再由几次的发刊‘新诗歌专号’虽然有些不成熟的作品，但明白了：‘一切的缺点和错误都可由创作实践中得以解决’，该刊的努力，也很使我们钦佩了。总之，在荒芜的绥远文艺界该社总算做了一些较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了”。另外由洪深、沈起予在上海主编的《光明》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读者之页，绥远青年诗人刘映元写给洪深先生的信中，介绍绥远文艺界的情况时说：“塞原社是绥远文坛的巨星，出刊《塞原》和《塞北诗草》两种刊物，内容丰美……”等等，当然，他们这样说也未免过誉了。但多少也可以看出塞原社和《塞原》当时在绥远文艺界的作用和影响了。